

《中外热点论争》丛书

主 编 ◎ 程恩富

副主编 ◎ 李建国

刘国光 卫兴华 吴敬琏

SHOURU FENPEI
ZHIZHENG

收入分配 之争

杨静◎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外热点论争》丛书

主 编 ◎ 程恩富

副主编 ◎ 李建国

SHOURU FENPEI
ZHIZHENG

收入分配之竞争

杨
静
◎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收入分配之争 / 杨静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 - 7 - 5161 - 1481 - 0

I. ①收… II. ①杨… III. ①收入分配—中国—文集 IV. ①F124. 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864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杨晓芳

责任校对 潘立江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266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十二五”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时期，但是在我国生产力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不公平感明显增强的趋势，这将影响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收入分配问题已引起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有关缩小贫富差距和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话题成为专家学者的聚焦领域、争论的焦点。

当前，造成我国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何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针对这些问题，《收入分配之争》一书选编了对收入分配问题持不同看法主张的专家学者的文章。书中文章根据专家学者的不同观点、政策主张分为 A、B、C 三方，其中 A 方文章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从所有制等角度研究收入分配问题，其核心观点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的劳资对立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并指出以新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的思路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是不可取的，保证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原则真正落实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B 方文章则主要认为垄断、腐败、政府不

作为等是导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主张加强市场分配机制的功能，通过市场化改革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C方文章则主要通过实证检验影响收入差距的一系列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定量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从而为合理制定收入分配政策提供依据。本书精心选编了三方观点的论辩，以飨读者。

目 录

前言 / 001

A 方 / 001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收入分配问题

刘国光 / 003

关于当前劳动收入分配问题释疑

程恩富、余斌 / 017

构建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收入分配体制研究

卫兴华、张宇 / 026

再谈分配不公的主要矛盾和根源

吴宣恭 / 037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壮大国有经济

项启源、杨承训 / 05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

胡 钧 / 071

关于两极分化问题的几点思考

周新城 / 082

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郭 飞、王 飞 / 092

从生产条件分配看我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及调节政策

陈享光 / 107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市场因素分析

谷亚光 / 115

“过度市场化”，还是“民生导向的社会主义化”？

周 宇 / 125

B 方 / 137

缩小收入差距不能单靠再分配

吴敬琏 / 139

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张维迎 / 142

收入分配改革要解放思想和科学研究

周天勇 / 152

我国当前分配不公的成因和对策

蔡继明 / 158

目

录

003

阻断扩大收入分配差距的“灰手”

王小鲁 / 169

我国市场化改革与收入分配

李 实 / 175

中国的腐败、收入分配和收入差距

陈 刚、李 树 / 185

C 方 / 205

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问题的冷思考

邹东涛 / 207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警度警情分析

顾海兵、王亚红 / 218

市场抑或非市场：中国收入不平等成因实证分析

陈光金 / 226

收入分配公平性偏态分布方法警戒标准研究

邵建平、孟 鑫、邓兆卉 / 254

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经济学解释

罗长远、张 军 / 266

论所有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

孙章玥、斯考特·萨姆纳、范从来 / 285

后记 / 299

A 方

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的劳资对立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

以市场化改革的思路调整收入分配制度是不可取的，

保证以公有制为主体、

按劳分配为主原则真正落实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收入分配问题

刘国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

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时，人们往往从分配领域本身着手。但是，仅仅从分配和再分配领域着手，还是远远不够的，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贫富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还需要从所有制结构，从财产制度上直面这一问题。所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扭转贫富差距扩大趋势，应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保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两个为主原则的真正落实。

进入 21 世纪，随着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日益明显，收入分配问题受到关注。在继续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的基础上，如何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命题。我曾发表几篇文章，研讨收入分配问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逐渐淡出，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鼓与呼。现在看来，我的观点和中央在这一问题上最终决策的精神是一致的。这里我想梳理一下改革开放新时期收入分配政策的演变，侧重谈谈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认识，并对今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出一点思路。

一 收入分配政策的演变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分配政策，从最初打破平均主义，为按劳分配恢复名誉，到现在继续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分配政策，从最初打破平均主义，为按劳分配恢复名誉，到现在继续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经历了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按劳分配成为中国最基本的收入分配制度。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75年宪法也规定要实行按劳分配制度。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一些高层领导，误读了马克思关于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式的“平等的权利”的论述，把战争环境中实行过的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供给制度理想化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等人又把这种认识推向极端，把按劳分配视为资产阶级法权进行批判，把八级工资制等社会主义政策看成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基础和温床。因此，平均主义盛行。这种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歪曲，带来的不是普遍的富裕，而是共同的贫困，这个现在大家都很清楚。

因此，粉碎“四人帮”以后，经济学界拨乱反正，最早就是从为按劳分配正名开始的。1977—1978年，由于光远同志倡议，先后召开了四次全国按劳分配理论研讨会。通过讨论，大多数同志认为，按劳分配不但不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且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必由之路。我国不存在按劳分配贯彻过分的问题，而是贯彻不够。

从中央的政策来讲，当时也是强调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我

手头有几份材料，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一是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报告提出：“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在思想教育上大力提倡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在经济政策上则要坚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并且逐步扩大集体福利。”二是五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也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分配上，既要避免高低悬殊，也要反对平均主义。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三是1978年5月5日，在邓小平的鼓励 and 指导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同志撰写了《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一文，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使按劳分配的名誉得到了正式恢复。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思想：“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当时，很多人有顾虑，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会不会导致两极分化呢？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里面讲了一句话：“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这句话中“依靠勤奋劳动”很重要，是避免两极分化的关键所在。邓小平也多次说，“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

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

198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这是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该文件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个体经济和少量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肯定了发展私营经济。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加了一条，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发展。当然，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早在1982年宪法当中就已经得到确认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分配关系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上述生产关系的变化，必然带来分配关系的变化。因此，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其他的分配方式”，十三大报告中列举了好几种，包括债券利息、股份分红、企业经营者部分风险补偿、企业主因雇佣带来的部分非劳动收入。这和以前就有了很大不同，既有“诚实劳动”带来的收入分配，又有了“合法经营”带来的收入。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这个提法和十三大相比又有较大变化，主要是两点：一点是“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而不再是“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这是在此之前，1994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来的。另一点是“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我觉得，从一定意义上讲，经营收入、技术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都可以看做是一种复杂劳动收入，应当包括在按劳分配的范围内。但资本收入作为一种财产性收入，情况就与劳动收入不一样了。由此，在收入分配中，形成了一个劳动与资本相互逐

利的关系，近些年来呈现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相对缩小、资本收入份额相对扩大的趋势。收入分配政策的变化大致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二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口号的由来

1993年，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即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这两者关系，由效率、公平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改为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虽然也很重要，但处于“兼顾”的次要地位。

从学理上说，公平与效率这一对概念，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常识告诉我们，收入分配越平均，人们的积极性越削弱，效率自然会低；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只要分配程序、规则公正，就会有助于提高效率。从另一角度说，不提高效率，“蛋糕”做不大，难以实现更多的公平措施，解决社会增多的矛盾；但是，如果不讲公平，收入差距拉得过大，特别是分配程序、规则不公，也会导致效率的下降，甚至影响社会稳定。所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过小都不利于提高效率。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不容易，要辩证统一地考虑。

中国改革开放前，“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起来，非常见效。于是经过十多年，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写进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议。据我所知，这是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到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问题。在此之前，无论是中央文件还是学术界，都没怎么谈这个问题。

1993年，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即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为“效率优先，兼顾

公平”，使这两者关系，由效率、公平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改为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虽然也很重要，但处于“兼顾”的次要地位。这两次会议的两个“兼顾”意义很不相同。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一直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每次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都这么提。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是我国在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正式精神。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补充了一句，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这也是很重要的分配政策。

共产党向来主张社会公平和公正。为什么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分配政策上要把公平与效率相比放在“兼顾”的次要地位呢？这与中国经济长期落后，难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解决众多社会矛盾有密切的关系；也与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发展趋势，及其带来巨大机遇与挑战有密切关系。这种情势迫使我们积极进取，尽一切努力增大我国的国民财富和综合实力。所以邓小平南方谈话要求，“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与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样就把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和国家经济实力即“做大蛋糕”的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效率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另一方面，制约中国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当时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的影响，比如奖金人人有份，奖励先进轮流坐庄，特别是脑体倒挂现象很严重，知识分子常常感叹“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因此，为了更快提高效率，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就必须进一步“打破平均主义，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这句话也正是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所作的说明。

因此，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提法，把“做大蛋

糕”放在经济工作的第一位，而把“分好蛋糕”放在第二位，这是适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当时是完全正确的。在这一时期，中央文件中一再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主观上并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意思。

三 淡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突出社会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而不是整个市场经济历史时期不变的法则。

当前应该逐步淡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增加公平的分量，降低基尼系数增高的速度、幅度。

长时间以来，我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多一些，不大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收入差距问题日益显露，国际公认的公平分配指标基尼系数从改革开放之初的 0.2—0.3，已提高到 0.4 国际警戒线以上，从而引起广泛关注。这时候，我开始思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不是该淡出了？

我通过研究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一定时期收入分配的指导方针，而不是整个市场经济历史时期不变的法则。许多同志把这一方针视为市场经济不变的法则，这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一些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就没有这个提法。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推行了社会保障、福利的措施。现代自由主义国家既强调效率，也不得不讲公平；现代福利主义国家很强调公平，但也讲效率。他们的效率和公平，都达到相当的水平。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社会公平、福利的一些措施，实比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完备得多。当然这有历史发展的背景，不好简单地类比。